

从文物资料 看历史上昭馥祁泽藪的变迁

□ 王京燕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端,北接文水,西邻汾阳,西南与介休接壤,南靠沁源、沁县,东南与武乡毗连。2009年为配合平遥至榆社高速公路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平遥弓村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遗址。弓村隶属段村镇,西壁距平遥县城西南10公里,遗址位于村西北0.5公里处,弓村一带属丘陵地带,地势由北向南阶梯状渐次升高,北与地势低平的介休东北平川接界。遗址东西长约15000米,南北宽约近20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平榆高速公路建设范围内弓村遗址以南的介休境内则没有发现古遗址,仅有清代墓葬。在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的蚌壳十几个或几十个堆积在一起,像是有意保存的,这些蚌壳在当时常用作生产、生活用具或加工成装饰品。此外,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质鱼形饰件。由此看来,弓村遗址附近在五千年前当有水域存在,如果当时有河流或湖泊,在地势低平的介休境内更容易找到线索,可是一望无际的平川上只有村庄和田野,并不见河流或湖泊的踪迹。或许五千年来,这里已经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

太原盆地也叫晋中盆地,位于山西中部,北起黄寨的石岭关,南至灵石的韩侯岭,东西两侧以断层崖与山地相接,盆地呈北东—南西向分布。长约150公里,宽约30~40公里,包括整个汾河中游,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有研究表明太原盆地早更新世时是一片汪洋大泽,随着新构造运动和汾河的侵蚀切割,在南部切穿灵石峡谷,湖水南泄,盆地边缘形成洪积扇地形,而中部在介休以北,平遥、祁县、太谷以西,文水、汾阳以东

形成一个湖泊,即见于古文献的昭馥祁藪^[1]。

《周礼·职方》载:“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太山,正北曰并州,其泽藪曰昭馥祁。”《尔雅》中也把昭馥祁列为当时全国十藪之一,但是归于燕境^[2]。《吕氏春秋》作大昭,《淮南子·坠形》作昭馥,都列为当时全国的九藪之一。《春秋大志表》:“祁县东南八里有古祈城,志以为晋祁奚邑,县以近祁藪而得名,即《尔雅》所谓‘昭馥祁’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中华历史大辞典》:“邬,县名。春秋晋置,治所即今介休东北邬城店。”《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平遥县:“又邬城泊,在县南,与介休县接界,又东接祁县昭余祁藪,亦谓之邬泽云。”考古资料证明的五千年前存在于弓村南部的地域应当就是“邬城泊”。

有学者根据春秋至汉代关于昭馥祁史籍资料记载,参考卫星影像,结合地质资料初步划出昭馥祁的四至范围^[3],并分析了昭馥祁在历史时期的变迁及其原因,其研究结果无疑是科学严谨的。但是它的局限性是上限只能到春秋时期,并不能反映出史前及商周时期昭馥祁的范围。本文旨在通过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昭馥祁左近活动范围的变化,结合文献资料,勾勒出不同历史阶段昭馥祁分布的范围,廓清其逐步成为陆地的变化过程。对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人地关系的演变,气候、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与制约及深入认识晋中盆地考古学文化及其与周邻地区的关系将大有裨益。

二

汉代以前,文献中关于昭馥祁藪的记载仅仅

是大概的方位,本文根据昭馥祁周边遗址的分布情况,分三个历史阶段划出汉代及其以前历史阶段人类在昭馥祁周边的活动界线。

第一阶段:史前时期——夏商(夏商时期遗址发现较少,均在史前时期遗址界线以内)

东界:介休东湖龙、邬城店、旧堡、平遥弓村、梁赵、罗鸣;祁县温曲、北团柏;太谷桃园堡、朝阳、西吾、任村;晋中下丁里、源涡、聂店一线。

西界:孝义封家峪、张家庄;汾阳见喜、宏寺、罗城、杏花村(汾阳以北基本分布在307国道沿线及以西地区);文水上贤、马村、西夏祠、章多、开栅镇;交城洪相、瓦窑、瓷窑、覃村;清徐新民、都沟、马峪至太原晋源镇一线;

北界:晋中鸣谦镇至太原金胜镇一线。

南界:介休义棠镇温家沟以北。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

东界:介休境内基本与前段同;平遥东胡、阎良庄;祁县城赵镇、梁家堡;太谷境内基本与前段同;晋中陈侃、聂村、流村一线。平遥县城以南界线和第一阶段基本重合,县城以北、祁县、晋中境内东界略向西移。

西界:唯交城境内从开栅镇略东移至大陵庄(即赵国的大陵邑)、清徐北部略东移至清源镇(梗阳城),其余和第一阶段同。

南界:现介休市区以南,较第一阶段界线略向北移。

北界:太原境内南移至晋源镇,其余与前段同。

第三阶段:汉代

东界:平遥境内继续西移至南北庄、京陵、东大阎,其余与前段同。

西界:孝义西关、新庄、大虢城;汾阳路家庄、潞城、义安、西堡、冀村镇;文水上贤、孝义镇、冀周、南徐,其余和第二阶段同。较之第二阶段,汾阳境内东移距离大,孝义、文水境内略有东移。唯有汾阳李家庄孤军深入至和平遥交界处。

南界:介休市区、孝义小王营。

北界:与前段同。

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遗迹分布情况,再结合文献资料,昭馥祁的变化轨迹大致可呈现出来。

第一阶段四界范围内,没有发现人类活动遗迹,推测那时的昭馥祁水位较高,是连绵的湖泊湿地。第二阶段四界范围内北部已出现大片陆地,太原金胜镇以南至徐沟有零星的遗址。第三阶段东西边界分别内移,但移动的距离不是太大。《汉书·地理志》太原郡邬县:“九泽在北,是为昭馥祁,并州藪。”这就说明昭馥祁水位下降,陆地面积增多,湖泊被陆地分割成数块面积较小的水域。四界范围内的南部原昭馥祁腹地已经有人类活动,如汾阳和平遥交界的李家庄遗址。

汉代以后,晋中盆地见于文献记载的湖泊泽藪有“晋泽”、“洞过泽”、“邬泽”、“祁藪”、“文湖”、“武潞泊”、“伯鱼泊”等,这些湖泽亦即《汉书·地理志》所称的九泽。本文主要根据史料记载,结合遗址及古建筑分布情况,为昭馥祁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提供最直接的证据。

晋泽《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太原县:“台骀泽在县南十里,即晋泽也。旧为晋水汇流处,蒲鱼所钟。广二十里,今堙为民田。《水经注》:‘晋祠……又有泉出祠下,曰滴沥泉,其泉导流为晋水,潞为晋泽。’今泽已湮涸。”

洞过泽《水经注》:“……其水又西南流迳武灌城^[4]西北,洞过水又西南为淳湖,谓之洞过泽。”唐代的地理著作《元和郡县图志》中已不见洞过泽的记载,估计那时已淤涸。现榆次陈侃(武灌城)、近城、使赵一线以西至和太原交界处,仅有明清古建筑和遗址,当是洞过泽当年的水域范围。

武潞泊、伯鱼泊《大清一统志》卷九十六:“武潞泊,在文水县南二十里,唐天授二年,赐名朱雀泊。又县东南三十里有伯鱼泊,今皆涸。”今文水县北张乡有南、北武潞村,梁家堡以西,南、北武潞村以东,石永以北一带地势低洼,村落稀少,“武潞泊”和“伯鱼泊”应在此范围内。

文湖《水经注》:“文水又南迳兹氏县故城^[5]为文湖,东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谓之西河泊,在县直东十里;湖之西侧,临湖又有一城,谓之潞城^[6],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猪,盖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城东十里,汉唐本大泽,与汾河不通,后决流通汾水遂涸。”^[7]古文湖在今汾阳三泉镇巩村东,目前在孝义境内大孝堡以北,大虢城,

汾阳境内见喜、路家庄、潞城以东,西陈家庄、唐兴以南,李家庄、南上达以西范围内,没有发现元代以前建筑和遗址,古文湖应在此区域内。文物资料表明,明代原古文湖边缘地带已经有零星的村落了,如阳城乡董家庄、演武镇招贤等。

昭馥祁《水经注》:“汾水于县左^[9]迤为邬泽。《广雅》曰‘水自汾出为汾陂,其陂东西四里,南北十余里,南接邬。’《地理志》曰‘九泽在北,并州藪也。’……侯甲水出谷西北流,迆祁县故城南,自县连延西接邬泽,是为祁藪也,即《尔雅》所谓‘昭馥祁’矣。”据《水经注》所指的水域范围,大陵县汾陂南接邬,祁藪自祁城村西南接邬泽。祁县附近的水域为“祁藪”,跨平遥、介休的水域为“邬泽”。结合人类活动遗迹看,介休市区以北,东至北盐场,平遥南北庄、梁关,祁县荣仁堡、祁城;西至孝义东董屯、霍家堡、汾阳南上达、唐兴;文水梁家堡、祁县县城以南的范围内没有发现北魏以前的遗址,与《水经注》所指的水域范围相吻合。唐《元和郡县图志》介休中仅有“邬城泊在县东北二十六里”的简单记载,没有提及“祁藪”,至此“祁藪”已消失。光绪《山西通志》卷十七:“昭馥池在县东南七里祁城村,《周礼》‘昭馥祁’即此,久涸。元至元十一年濬水为昭馥池,即其地立祠,后池复涸,国朝顺治九年复盈”。元代时久已干涸的“祁藪”被开发为纪念性的人工池塘,此后受降水量的影响时涸时盈。

明成化《山西通志》平遥县:“张赵泊,在县西北三十里,一名壤公泊。又邬城泊,在县南,与介休县接界,又东接祁县昭余祁藪,亦谓之邬泽云。”《读史方輿纪要》介休:“邬城泊县东北二十里,与平遥县接界。流合中都水,注于汾河,或谓之蒿泽。”“小桥泊,在县东北十八里,亦西入汾河。”

平遥境内杜家庄乡东风落村以南,道备、南政、介休北盐场一线以西,平遥、汾阳交界处以东,介休北辛武以北区域内虽然分布着稀疏的村落,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清代的古建筑^[9],而且这一区域内的村落远不如汉代四界范围外的密集,说明人类在此区域内开始活动的时间比较晚。

“张赵泊”、“小桥泊”等湖泊名称陆续见于北

魏以后的历史著作中,说明“邬城泊”水域面积不断缩小,又被陆地分割出“张赵泊”、“小桥泊”。现平遥宁固镇有东张赵、西张赵村,或许和“张赵泊”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历史著作并没有提及“邬城泊”何时干涸,“邬城泊”在不断瘦身、分割出若干小湖泊后完全成为陆地的时间或许在明清之际。至此,曾经烟波浩淼的“昭馥祁藪”不断地缩小,直至消失。五千年前生活在波光潋滟、水草丰美的昭馥祁藪边的小村落已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

三

昭馥祁数千年来沧海桑田的变迁,首先和气候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竺可桢先生研究表明:在近五千年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C 左右,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中曾经有打猎时捕捉到大象的记载。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摆动范围为 $1\sim 2^{\circ}\text{C}$ ^[10]。可见商代以前,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由于气温下降,降雨量较前势必会减少。

第二,由于战争、垦荒等一系列对森林无节制砍伐的破坏性行为,造成常年水土流失,暴雨时节,上游河流冲刷出大量泥沙,聚水的洼地被泥沙淤塞,导致泽藪面积缩小、消失。明阎绳芳《镇河楼记》:“东南麓台,上下幘诸山,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壤,必剗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南北。而祁之富饶,减于前之什七。”这是前人经历了林木被毁,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后的痛心与无奈之语。

第三,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水利事业向来是农业生产的命脉,自古以来修渠灌溉就深受统治者的重视,汉武帝曾言“农,天下之本也”,

(下转 60 页)

历史,因而也才是最高的本体或本质的存在。如果他们背离了这种精神,离开了这一本原,离开了这个形而上的哲学宇宙观和人生观,自然就割断了柱础石装饰艺术存在的价值源头,在精神生活上也变得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宗祠戏台前的柱础石纹样中以暗八仙装饰纹样也是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

结 语

常家庄园的柱础石雕刻艺术以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为我们研究传统美术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也为我们当今的

建筑装饰提供了许多参考资料,对于它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耿彦波《常家庄园》,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6页。
2. 王抗生《中国传统艺术(1)》,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月,第2页。
3. 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70页。

(作者工作单位:刘卓,晋中学院;刘变琴,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上接45页)

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11]关中地区受惠于分别修建于战国末年和汉武帝太始二年的“郑国渠”、“白渠”,物阜民丰。当地人民欣然而歌:“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垂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2]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已由秦统一全国时的2000万增加到4.46亿^[13]。水利事业在官民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得到空前发展。《榆次县志》:“唐贞观时,孙湛为令,始渠洞过,教民灌田。至宋,桑安世复引涧河,于是县多受灌溉。……若元明之时,穿渠尤众。”其时,为溉田争水讼狱的案件时有发生。由于竞相引水溉田,有的河流几近枯竭。平遥县的婴涧渠、盘石渠、鲁涧渠,“三涧皆引资灌溉,其水不复汇流成川”^[14]。开渠之外,政府官员还帮助村民穿井灌溉。介休“万历十七年史令教民穿井六百有奇,贫民不能持耒插者,一井借谷五斗,共穿一千三百余井。”^[15]大规模的穿井灌溉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这些利国利民的水利措施,也是晋中盆地湖泊逐渐萎缩的直接原因。

此外,历史上汾河、潇河、文峪河几经变迁,对昭余祁的湮塞有很大影响^[16]。

曾经是全国九泽之一的昭余祁,在历经了数千年的变迁后,只能在史籍中觅得一些踪迹。人类在饱尝环境恶化的苦果后,会更多地思考如

何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和谐相处。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滨水而居的史前村落会逐渐呈现出来,昭余祁泽藪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面貌会越来越清晰,同时也为晋中盆地西周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1][16] 王尚义《太原盆地昭余古湖的变迁及湮塞》,《地理学报》1997年5月第52卷第3期。

[2] 戴震:“《尔雅》、《吕览》所称昭余祁、大昭黎之燕,燕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遥、介休甚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版。

[3] 同[2]。

[4] 今山西榆次陈侃村。

[5] 兹氏县城故址在今山西汾阳市三泉镇巩村东。

[6] 今山西汾阳市东南约5公里有潞城村。

[7] 《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三十一。

[8] 《水经注》中“汾水于县左迤为邬泽”,即大陵县,故址在交城与文水交界的大陵庄。

[9] 《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卷》。

[10]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1][12] 《前汉书·沟洫志》。

[13]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15] 光绪《山西通志·略十》。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